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闽粤赣经济区由福建西部的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广东东部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梅州市，江西南部的赣州地区、抚州地区、鹰潭市等三省十三地市所组成。该区从山区向平原，再向海洋延伸，处于北回归线上，气候宜人，与太平洋国际主航道为邻，是西北太平洋区域及我国中北部的船只进入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该区位于长江三角洲（下称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之间，与台湾省隔海相望，还是著名的侨乡。该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经济发展较落后，是南中国经济增长带中的“断层”和薄弱环节。

当前，为解决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需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国内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服从于缩小与世界发展水平差距这一总体目标。为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将南中国经济增长带的潜能全部释放。南中国经济增长带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粤赣经济区和台湾省、香港、澳门行政区。这一增长带是中国目前和将来最有活力、最开放的地带。经过 20 年高速发展，仍蕴涵着极大的发展潜力，经济发展仍处在高速扩张期。位于珠三角、长三角之间的闽粤赣经济区是南中国经济增长带中的“断层”地带。闽粤赣经济区的总面积为珠三角的 4 倍，人口为珠三角的 2 倍，而 GDP 仅为珠三角的 62%，人均 GDP 相当于珠三角的 21%，与长三角

的差距更大。从发展的态势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着力点。地处南中国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如何实现南北呼应、共创繁荣是一个关系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全面分析研究闽粤赣区的产业素质，促进该区产业升级，缩短该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差距，变“断层”为“桥梁”，让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相隔遥远的发展极融会贯通，使南中国的海岸线上崛起一条由长三角、珠三角和闽粤赣经济区这三个成长三角所贯通的新的经济增长带，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闽粤赣经济区“台”、“侨”特征突出，区域产业素质升级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使中国经济更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具有重大意义。闽粤赣经济区位于台湾省海峡西岸，与台湾省隔海相望；还是著名的侨乡，是 2000 万海外华人华侨的祖居地。闽粤赣经济区与台湾语言相通、生活习俗相近、宗教信仰相同。两地民众普遍信仰妈祖。台湾省现有妈祖庙 800 多座，大多由本区祖庙分灵而来。1997 年 2 月福建湄洲祖庙妈祖金身首次巡游台湾省，历时 100 多天，引起岛内极大轰动。近 10 多年来，台湾省与本区产业协作十分密切。例如，台湾海霸王、味全、旺旺等名牌企业已落户本区。1997 年 4 月本区的厦门与台湾高雄也实现了试点直航。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大陆转移在 90 年代已基本结束。目前，台湾与本区产业协作正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本区由于产业素质偏低，承接能力极为有限。作为台湾最近、最有文化历史亲缘关系的本区，却难以跟上台湾产业升级发展的步伐。目前，闽粤赣经济区加强与台湾经贸关系的核心，就是要促进本区产业升级，尽快壮大本区的经济实力，使本区与台湾在经济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与台湾产业高度融合的海峡西岸的繁荣与崛起必将有力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闽粤赣经济区海外华人中涌现出一大批企

业家、工商界巨子，他们成就显赫、富甲一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如李嘉诚、王永庆、陈有汉、谢国民、林百欣等。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素有寻根访祖报效家乡的传统，他们对推动本区产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闽粤赣经济区具有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层面，其产业素质升级研究对探索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缩小地区差距、缓解地区发展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在继续促进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快中部经济的崛起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启动开发，即“东部持续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启动”，充分发挥东南沿海这一发展极的扩展效应的作用，促进经济水平的梯度推移，辐射并带动中西部协调发展。

产业素质升级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增强区域创新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竞争力的源泉不是一国的“初始资源禀赋”，而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

国家创新系统的“自下而上”的构建特征，客观上要求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和创新网络的结点。它体现国家创新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如果没有各层次的地方性创新网络的发育，国家创新系统则无从奠基。在国土面积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中国，尤其需要重视地方创新系统的建设，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部分单元，中国的地方经济具有相对的完整性、独立性以及独特的“个性”等特征。因而在创新活动中也就具有一些新的特点。这就使得各个地方在建立自己的创新系统时，不能照搬国家创新系统的做法，需要按照各自的特色来设计地方创新系统。过去，经济建设中“一刀切”、“靠一个脑袋”、“推广一个模式”，抑制了各经济主体优势的发挥，个性的宏扬。改革开放后，地方被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得到尊重，其内在的活力受到激发，建

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出现“万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应有之意！

同时，新的国际分工不再以国家为基础，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条件，塑造中国世界级的地方品牌，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当前，在全球化过程中，“地区”的形象超越了国家边界，也超越了大企业概念。新的国际竞争力主要的不是以国家为依据，而是以地方竞争力来表现。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如硅谷、伦敦、新竹被认为比整个美国、英国、中国台湾省更具有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含义。

因此，结合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特征，全面探讨中国地方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此基础上探寻闽粤赣经济区产业素质升级的步骤、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创新点和研究路线

一、丰富政府作用的经济学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理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道德人理论”，还是弗莱堡学派的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裁判员”理论，抑或丁伯根计划模型，经验结构主义模型等，均未研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作用。国内经济学界有一些研究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论著，较有代表性的是沈立人著的《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年），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均从打破诸侯经济、地方保护角度研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其中心议题是弱化地方政府权能。本书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是准创新主体，地方政府在地方创新系统的构建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命题的成立将丰富政府作用的经济学理论。

二、丰富创新理论，并对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西方创新学说中，从熊彼特创新论到弗里曼的国家创新系统论，均未涉及地方创新系统问题。国内的一些研究均着重探讨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系统问题。

本书认为，区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须符合同质性、联系性和经济管理的便利性要求，否则区域经济便没有生命力。从全国各地的区域协作陷入困境可以发现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缺乏可行性。中国 40 年计划经济决定中国行政区具有坚固性，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合性以及边界经济的衰竭性是目前区域经济最显著的特征。转型期应侧重研究行政区域的创新系统问题，即地方创新系统问题。本书以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地方创新行为为蓝本，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创新的机制与规律，得出相关理论结论。将丰富创新理论，并能对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能丰富中国的区域经济理论

经济区划是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区划是根据经济区形成与发展的任务而对国土进行的划分。

20 世纪 50 年代，为谋求沿海和内地的平衡发展，我们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将全国经济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域。50 年代至 60 年代末，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加之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基于战备需要和国防考虑，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上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地区。一线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三线地区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湖北、湖南、山西等省；其余地区为二线地区。60 年代到 70 年代末，又根据各大军区，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北、

华东、东北、华南、闽赣、山东、新疆十大片。上述地区经济区划，未考虑市场因素，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从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促进经济资源配置和横向经济联合角度，进行经济区划的研究。

早在 1981 年，胡序威提出应“积极开展我国经济区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的研究”^①建议，经济区划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此后，不少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区划建议。1985 年陈栋生提出应将全国经济划为“六大经济区”，即建立东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南方、新疆、西藏六大经济区。

1987 年国家“七五”计划提出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即将全国经济划分为东、中、西三种不同地带经济区域。东部沿海经济带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等 12 个省市；中部地区是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 9 个省区；西部地区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 9 个省区。以此为依据，中国实行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倾斜发展战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地区经济差距日益加大的矛盾问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区划上强调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融合。国家计委提出了“七大片经济区”的设想，即长江沿岸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和华南地区、中部地区等。^②

胡序威. 积极开展我国经济区划与区域规划的研究 [J]. 经济地理, 1981

(1): 74 - 76.

②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M]

1996

改革开放前，将经济区与行政区统一起来的划分方法，对于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三大地带的划分，对于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0年代后，地区经济差距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区域间的互补合作受到重视。经济区划上强调打破行政区、三大地带，按“流域”、“片”进行经济区划，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相当长一段时期，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在作经济区划时，均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区域——闽粤赣经济区。该区各地市既没有划进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又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获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认同，而长期处于区域规划的次级区域，成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夹缝地带，这种状况与该区域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极不相称，应引起高度重视。本书从闽粤赣经济区产业素质升级的一个重要手段——地方创新系统的建立角度进行相关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理论。

四、本书的研究成果将对中国各地正在兴起地方创新活动提供较大的指导和帮助，进而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担负着完成工业化和推进信息化的双重任务。这样一个经济转换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作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有效手段，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闽粤赣经济区是全国惟一的包括老区、山区、边缘区、贫困区、特区多种经济类型的区域，具有多层次的生产力，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历史上有浓厚的地缘、亲缘、人缘、神缘关系，经济往来密切。区内的潮人文化、客家文化和闽南文化构成区域的主流文化，三种文化的共同点是人际关系重伦理、情谊、责任和奉献，认同性和凝聚力很

强。只是在语言、音乐、戏曲、过节、拜神中各有不同的民俗。产业发展各有优势和特点，产业协作基础雄厚、互补性强，该区产业升级发展对其他老少边穷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地方创新系统问题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的研究成果将对提高中国整体创新水平和促进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由于受我们能力的限制，不可能很好地达到上述目的。我们的工作是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在前人还没有充分展开研究的一些问题上，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微小的贡献。

第三节 本书结构

本书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说明研究的起源和选题的动机，并提出本书将达到目的，以及本书的框架结构。

第二章 创新文献综述

本章主要对相关研究文献按历史发展线索进行了综述，作为本书理论分析和研究设计的基础。文献综述分五个部分：

1. 比较全面分析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容、贡献、局限性。
2. 分析技术创新论的发展，具体论述了以索洛、阿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曼斯菲尔德、卡罗为代表的熊彼特学派和弗里曼、纳尔逊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3. 分析研究了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包括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4. 对中国的创新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包括傅家骥教授的

技术创新论、夏振坤教授的制度创新论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

5. 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综合评析，提出要加强转型期制度创新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加强对中国地方创新系统的研究。

第三章 闽粤赣经济区产业结构与产业素质的实证研究

本章重点研究闽粤赣经济区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探讨该区产业升级的基础和起点。

第四章 地方创新系统的研究边界及理论基础

本章提出了地方创新系统的定义及其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关系，地方创新系统的功能、目标、要素、基本特征和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五章 地方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

本章在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地方政府地位、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地方创新系统中的准创新主体的命题，并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验证。

第六章 地方创新系统中的企业

本章分析了地方创新系统中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提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并分析了企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第七章 地方创新系统中的产业集群

本章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各种效应，提出人才、技术、资源等优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产业集群带来的地方创新优势更难以模仿、更持久。产业集群是地方创新系统的主要手段。并以汕头、厦门的产业集群效应为蓝本进行实证检验。

第八章 地方创新系统中的中介服务体系

本章分析了中介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并着重分析了企业孵化器、行业协会、产学研合作等在地方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第九章 地方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

本章在规定指标体系设定原则的基础上，分地方创新的经济基础指标、创新环境指标和企业创新能力指标，进行了地方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建立的探讨。并对其中的一些指标，如工业化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涉及的一些理论、模型进行了评述，提出了自己的应用研究建议。

第十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对前九章的分析进行了归纳和评价，得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二章 创新文献综述

第一节 创新理论的奠基之作：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1883年，马克思去世，熊彼特与及其学术对头凯恩斯同时诞生。20世纪30年代左右，熊彼特与凯恩斯几乎同时创立并完善了自己的学说。

由于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对以前背离现实的萨伊等人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在3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新经济学说。经济学说史上称之为凯恩斯革命。此后30多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一直扮演主流经济学的角色。与此同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形成了其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开创了创新理论的先河，在西方经济学界首次以创新理论来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熊彼特学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过于异端，加之时代局限，在相当长的时期，其理论被凯恩斯主义所湮没，未能引起世人的关注。

“二战”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学术观念逐渐得到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认同。熊彼特创新理论经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科斯、诺思等人的进一步充实、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区域创新系统论、国家创新系统论的确立，一座辉

煌的创新经济学大厦终于构筑起来了。人们共同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种不变观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具有和谐、无冲突的特征：经济发展是连续的、平稳的过程，即经济增长不是突然的，而是通过边际调节来推进的。②经济发展是和谐的、累积的，是以自动均衡机制为基础的，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冲突中会产生秩序，自私角逐中会出现和谐。这种自动均衡机制会保证各个收入群体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得益。价格机制是保证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经济发展的利益是会自动地、逐步地扩散到全社会各个阶层的。而熊彼特则在其著述中提出并完善了其创新理论。他以“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创新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打破经济均衡的过程。因而经济研究的重心不是探讨如何实现均衡，而是研究如何打破均衡，均衡的破坏就是创新。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开创了对“创新”问题的研究。相当一段时期，从马歇尔、瓦尔拉到凯恩斯等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和谐的，因此，经济学家应主要研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前提，就是技术和社会制度是不变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劳动、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分析。凯恩斯以后，经济学家对财政、税收、就业、价格、货币、利率等宏观经济问题倾注了较大的热情。惟独将技术、制度等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排斥在外。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创新消失，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消亡了。熊彼特看到了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他认为企业应该重视研究和开发活动，进而增加市场的集中度；他对制度的创新主要强调信用制度的重要性。熊彼特创新

理论从方法上看是撇开社会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种生产力层面的“纯经济特性”的理论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经济自由、增长的控制、法律安全等的研究是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家的全部职责就在于准确地揭示事件自身的逻辑。

由于熊彼特是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历史结构变化的角度，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研究创新问题的。因此，他不可能深入研究创新的机制、过程、影响因素、创新系统等，对制度创新的理解也比较狭窄。

1950年熊彼特去世后，其追随者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进行了规范与实证的进一步探索，形成了两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路线：

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论。以制度改革和制度推进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论。

第二节 技术创新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黄金期”，许多国家的经济在50—60年代取得高速增长，已不能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简单地加以解释了。由此，经济学家开始对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技术创新论得以发展。技术创新论以三个流派为其代表。

一、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认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将科技进步当作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没有人对科技进步要素进行深入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从50年代末期起，以索洛、阿罗为代表，该派认为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存在公共商品、创新收益的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败，政

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且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索洛还专门测度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7年索洛发表了《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函数》一文，他在文中采用实证方法考察了1909—1949年间美国的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发现这一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其主要的贡献来自于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占87.5%。^①索洛的实证研究充分说明，经济增长因素中除了劳动和资本外，还有技术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索洛之后，丹尼森、乔根森等增长经济学家将技术视同一种资本，把一项专门技术看作是一个资本单元，在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方面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学应加强对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

二、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以曼斯非尔德、卡罗为代表，该派坚持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侧重研究企业的组织行为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体包括：演进理论、创新扩散、企业战略、路径依赖等，并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创新模型，包括企业家创新模型、线形模型、连锁回路模型、创新周期模型等。新熊彼特学派的学术队伍已有一定规模，1986年在美国成立了国际熊彼特学会，现有会员500多人，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三、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其代表人物是弗里曼和纳尔逊。英国学者弗里曼1987年在考察日本时发现，日本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

^① Solow 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9, 1957, pp.312-320.

技术人员、管理者、政府等。由此，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不是企业家的功劳，不是孤立的，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纳尔逊则是以美国为案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归纳出的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是，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大部分用于国防科研，政府对创新的直接投入很少，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中非常活跃。

第三节 制度创新论的发展

制度创新论以两个流派为其代表：

一、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海尔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

该派以现行体制的反对派和批判者的身份，对现存制度进行抨击，如波兰尼 1944 年出版的《大转折》，对正统经济分析框架和现代神话似的思维方式予以猛烈抨击，确立了颇富启迪意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他们同马克思一样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认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制度才能促进创新，被学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派，终因结构松散而遭到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和嘲讽，不为正统经济学者所推崇，在学界影响不大。

二、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该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因而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诺思早在 1968 年就发表了其代表作《1600—1850

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根源》^①，在文中他分析了 1600—1850 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他的研究发现：在此期间，世界海洋运输业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业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文中，诺思通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没有新的海洋运输技术出现，但由于海盗对商船的侵袭活动的减少，以及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海洋运输成本降低了，因而使得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由此，诺思得出结论：在这两个半世纪里，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创新，而在于制度创新。此分支的启蒙者——科斯荣获了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诺思也戴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制度经济学在学术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利用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进行制度分析，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新解释，大大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在学术界造成重大影响。该派的基本思想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率率的制度安排，不是单纯的技术革新和进步，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不是源泉；制度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

第四节 中国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兴起了对

^① Douglass North.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 - 1850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September - October 1968: 953 - 970.

创新问题的研究热潮。一部分学者对技术创新有浓厚的兴趣，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柳卸林的《技术创新经济学》。该书从宏观的角度，较系统地阐述了技术创新的过程、机制、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企业、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还分析了创新政策、创新激励等问题。付家骥的《技术创新经济》。该书从微观的角度，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理论、过程、机制、要素、方式、战略和组织等。另一批经济学家则比较关注创新的制度性问题。夏振坤教授在《发展经济学概论》中认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一般存在市场短缺和政府短缺。因此，其主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制度建设尤其重要。张建华教授在《创新、激励与经济发展》中也特别强调制度与制度结构对创新的意义。吴敬琏教授的《制度高于技术》、杨瑞龙教授的《阶梯式的制度变迁模型》和《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他们在文中都表达了在创新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学术思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必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由此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渐成热点。有代表性的有：路甬祥的《创新与未来——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齐建国的《技术创新——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刘洪涛、汪应洛、贾理群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等。上述著述均在介绍西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对推动中国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理论指导意义。